

体制改革推动内生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潜力和需求空间

——基于二元体制的数理逻辑与数据测算

内容提要:文章分析了 1978—2023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结构,认为其高速增长的重要来源是,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要素生产率,以及土地有偿出让和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获得财富溢值。如何使定性的体制能够成为经济分析中的内生变量,是转轨经济学研究至今没有解决的难题。文章从渐进转轨和二元体制视角,寻找生产、不动产、分配和需求各领域中国市场经济状态下的标准值,还有计划行政干预下的偏差值,二者相互比较求出差值,分类定义为流量通过大小的闸口连续变量和能不能通过的开关变量,并将其组合入生产函数及其供给—分配—需求联立运算模型之中。以此数理逻辑方法,进行体制改革内生推动经济增长的分析,解释了 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动力来源。经仿真测算,中国无论是在供给领域,还是在需求方面,都蕴藏着规模可观的体制剩余和市场潜力。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体制改革,未来 11 年可以释放在二元体制中巨大的生产能力、财富潜能和市场需求潜力,使经济增长能够达到平均 5.5% 的速度。

关键词:体制改革 二元体制 内生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 数理逻辑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82(2024)09—0001—14

DOI:10.13891/j.cnki.mer.2024.09.001

一、渐进转轨经济增长计算在方法上的困难

就现代经济学经典经济增长的算式看,对于从经济落后向发达转变但体制为市场配置资源的国家有乔根森模型(Jorgenson, 1967),对于经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有索洛模型(索洛, 1956),而对于进入工业化、偏好国家集中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Harrod, 1948; Domar, 1946)等等。当然,还有一种是体制从计划向市场改革的转轨国家,如前苏联、东欧、中亚和蒙古等国和地区,绝大多数是三到五年瞬时完成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因此,也没有必要对这种时间很短的经济体,专门总结其经济增长的计算模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成立以来 74 年间,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为 7.97%,其中 1978 年改革以来为 9.02%。从其中的各个阶段看,1950—1956 年、1957—1977 年、1978—2010 年和 2011—2023 年,分别为 9.97%、4.97%、10.02% 和 6.48%,经济增长速度快

慢不一。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然而,与东欧和前苏联瞬时体制转轨的各国不同的是,中国在生产资料所有方面,安排以公有制为主和私营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在资源配置由计划行政向市场配置改革方面采取了渐进转轨的方式。如前所述的,在从计划行政向市场机制释放的阶段,在资本和劳动力比计划经济时期投入水平降低情况下,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却高出了一倍。当然,也由于人口增长和结构变化、国际经济关系不确定和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作用边际递减,计划行政与市场机制胶着并存这一时期,相比前一阶段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降幅为 37.76%,增长放缓的压力越来越大。

有学者就中国经济增长从供给经济学理方面进行了有益的讨论(贾康等, 2018)。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经济体制的安排和变化,深刻地影响着要素配置效率、收入分配流向和需求与供给的均衡,进而可以说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前述三大类增长

模型,是流动实体变量以不同的经济逻辑关系组合形成的函数,包括联立方程算法。而体制则是一种制度安排,并不是可以计量的经济流动实体。因此,无论将中国各个阶段的各种数据输入这些算式和联立计算系统,都无法从体制安排和变化的角度去分析、刻画和解释经济增长的损失和来源。

如何让现有的经济数据服务于政策和制度问题的讨论?伍晓鹰(2023)认为,制度没有办法直接量化,我们的体系是一个生产系统,无法把其他与生产函数无关的变量加进来,制度不可能是其中统计上可以建立的系统性变量,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办法让制度变量直接进来。2016到2023年间,笔者试图将体制因素变量化,并就其安排及其变化嵌入生产系统,实现量化计算,从而解决体制改革或者体制禁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损害不能量化计算这一经济学上的难题。

中国渐进转轨的特殊体制和长周期过程,给国内外经济学界,特别是对中国学者提出了必须要解答的这样一些问题:如何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奇迹的来源,如何分析中国2011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原因,中国未来10到15年还能有中高速增长的可能吗?国外一些学术研究机构和经济学者使用前述的几大算法分析,大多都认为中国未来不可能再有中高速增长的可能,速度大体在1.5%到3.5%的区间。当然,国内有许多经济学和政策研究机构认为,体制改革还能够释放各方面的潜能,使中国未来能够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那么,有什么数理逻辑来证明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内生的影响关系,是寻找潜能、安排改革和保证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只有找出各方面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内生影响关系的数理逻辑方法,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总体和各个方面的用于实践的改革方案。此篇论文,就这些问题的解决,从方法方面进行一个初步地尝试和讨论。

二、寻找可内生的体制变量和发现体制性剩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和经济管理者以为,华西里·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表(Leontief,1976)加上奥斯卡·李沙德·兰格改进的

中央计划机关价格试错机制,计划经济也可以使最优配置和均衡增长成为现实(兰格,1936、1937)。实际上,战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影响其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三个原因是:生产的低效率和高成本,无法支撑可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禁止交易的体制安排,妨碍了诸如土地和房屋不动产的价值化,使增长失去了其财富化的又一源泉;而诸多的计划配置和行政准入,又抑制了竞争,并阻隔了各经济要素的流动性。然而,在一个一元计划行政体制的国家里,人们对此熟视无睹。因为其经济内部场景中,没有就效率、价值和流动性等有关指标进行经常性对比的参照系。研究二元体制与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关系,首要的工作是寻找、发现和定义一系列有内在联系的定性方面的概念和范畴,以及定量方面的变量及其之间的内生联系。从而形成经济学的方法和逻辑体系。

1. 二元体制差值:闸口和开关变量

中国经济改革长周期的渐进转轨,形成了计划行政与市场机制并存的二元体制国民经济运行体系。国际直接投资流动、贸易进出口、人员往来和信息内外交流,也使这一二元体制经济成了一个开放性的体系。这就使计划行政与市场机制间效率、价值和流动性之间的差别,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两种区别和界定:市场机制经济标准状态,计划行政经济偏差和关闭状态。笔者初始的经济观察中,发现经济生活中,就生产要素看,加权平均的劳动力农业就业比例指标比较,与中国发展水平上下相当的国家数值低,而中国的数值高;资产利润率指标,国内非国有经济水平高,国有企业水平低;土地利用率,国内非国有单位利用率高,而有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利用率低。就不动产的土地和房屋看,农村向城镇转移的土地,政府少量补偿和无价格征收,但可以有偿并行政垄断市场竞价出让;对于城镇住宅,居民可以在市场上交易,是有价值的资产。农村土地和住宅,不允许交易,是无价值的生活和生产资料。这些不动产对于前者来说是财富,有价值、货币、债务和信用等市场经济的流动属性;但对于后者,其不是有价值的财富,没有市场经济意义上的流动性。

那么,如何找到渐进转轨国家对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发生内生影响的体制安排和变化的这一变量?

如果我们将市场经济领域没有计划和行政干预的有关数据定义为标准值,把受到计划行政干预的有关数据定义为偏差值,二者比较相减,所得就是差值。

一是有连续变化差值,即闸口变量,是规则性连续变化差值。例如生产要素方面,将发展水平相当并且人口能够自由迁移国家的劳动力农业就业比率,以及国内竞争性非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视为标准值,将有中国户籍等一系列阻碍人口迁移体制安排的劳动力农业就业比率,还有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视为偏差值,二者相减,获得劳动力投入端农业就业比率差值,以及投入产出端资产利润率差值。2022年时,一些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就业加权平均比率为10.15%,中国为24.08%,差值为13.93%。因为其在世界经济组织和国家统计局网站上较规则地进行常规统计和发布,数据较为准确,并且容易获得,称之为规则性差值变量。然而,还有非规则连续变化差值。如非国有单位员工冗员率和国有单位冗员率差值,还有非国有单位土地利用率和国有单位土地利用率差值,在统计网站上一般没有常规的统计发布,需要进行抽样调查和统计推断而获得,因此为非规则差值变量。数理表达为:

$$z_t = y_t - x_t \quad (1)$$

其中, z_t 为差值, y_t 为标准值, x_t 为偏差值。

二是有绝对差分变量,而且仅有0和1,定义为开关变量。它们的经济体制含义,是对某一物品进行的禁止交易和允许交易两种绝对性的体制安排,在经济流量分析上表达的是开关关闭或者开关打开状态。主要用来分析土地和房屋不动产的市场化和非市场化设置及其影响。数理表达为:

$$z = I(\omega) = \begin{cases} 0, & \text{禁止交易} \\ 1, & \text{允许交易} \end{cases} \quad (2)$$

$I(\omega)$ 为0,禁止交易,即扭曲值; $I(\omega)$ 为1,允许交易,即标准值。

闸口变量,给我们提供了测度渐进转轨国家经济体制安排和变化,对真实生产投入量和产出量内在影响强度大小的测度。而开关变量,则可观察体制内生安排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货币、价值和财富流量有或无的状况。因此,闸口和开关变量,可以成为二元体制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运算的内生变量。

与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这样的流动实体变量不同的是,从法定以及国民经济统计的原则讲,体制性的闸口和开关变量没有价格。然而,闸口和开关实际是一种经济活动中的计划和行政功能,其客观地创造了诸多的寻租机会,具体实施的工作人员,有可能利用权力寻租,从中谋取个人的利益。因此,审批许可在需要办理与提供办理之间存在着私下但不透明和不规则的价格。在公开的信息和公众的抽样统计上,无法表达闸口和开关私下价格之间,以及体制变量私下价格与流动实体变量透明价格之间的替代弹性。

2. 生产低效率和不动产无价值的国民收入损失

我们可以用闸口变量测算计划体制禁锢造成的产出损失。一是要素淤积未进入生产过程的产出损失。由于从流入端闸口 Z 禁锢生产要素在低生产率领域淤积,其并没有流入高生产率的领域,造成了产出损失。其计算式为:

$$Los_t = z_t \times Res_t \times FE_t \quad (3)$$

其中, Los_t 为产出损失, Res_t 为与生产和溢价有关的资源, FE_t 为每单位要素或资产净产出。

例如,2022年,中国总就业劳动力为73351万人,前述劳动力农业就业比率差值为13.93%,以(3)式计算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为10218万人,劳动贡献的年平均生产率为40539元/人,劳动产出系数为42.38%,当年禁锢和阻碍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体制造成的产出损失为42651亿元。

二是要素进入生产但效率较低的产出损失。这种生产结果性闸口 Z 乘以投入总要素表达的是低效率造成的产出损失。其计算式为:

$$Los_t = z_t \times Res_t \quad (4)$$

比如,2022年国有企业总资产为309万亿元,非国有企业资产利润与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差值为3.54%,因为低效率国有企业当年损失的利润产出为10.97万亿元。

上述式(3)和式(4)表达的是,由于阻碍生产要素正常流动、生产过程效率过低和禁止交易而无财富溢价,造成的产出损失。其刻画经济运行的状况:资源的浪费、闲置、低利用和禁止交易而没有流动性和无法价值化。通过这些内生的计算,可以解释计划经济时期或者二元体制经济中,计划行政体制安排对经济

运行效率和增长速度的影响。

3. 可以释放的体制性剩余

差值乘以所对应的资源、产出、分配和需求,就是其闲置、浪费和低利用资源、要素、产出、收入和支出,可以衡量过多和过少,定义为体制剩余、不足或者潜能空间(周天勇,2021)。二元体制经济学和体制性剩余,与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性剩余,有很大的区别。前者是指渐进转轨国家禁锢在计划行政体制中的各种经济剩余,其由闸口和开关变量进行计算。后者是结构转轨发展中国家,如劳动力剩余是原生性质的剩余;数量是与其新兴的城市和工商业部门人口收入、劳动生产率、就业工资等水平相比较,计算在不发达农村和农业中过剩的人口和劳动力。

二元体制经济要素流入端闸口 Z 影响的体制剩余算式为:

$$Sur_t = z_t \times Res_t \quad (5)$$

其中, Sur_t 为体制性剩余、不足或者潜能, Res_t 为与生产和资产溢价有关的资源。

然而,如果是产出端形成的闸口 Z ,则需要用产出总损失除以投入产出标准值,获得体制剩余量。其计算式为:

$$Sur_t = Los_t / y_t \quad (6)$$

用非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标准值 4.74%,除以国有资产低效率产出损失额,得出体制性剩余资产规模为 231 万亿元。

而体制性剩余资产的计算较为简单。禁止交易的各类资产,开关变量为 0,不存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资产;如果未来放开进行交易,则开关变量为 1,再乘以其影子价格,为体制性剩余资产。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测算的 2023 年体制性剩余土地房屋资产规模达 650 万亿元左右。

从中国 1978 年以来经济增长奇迹的来源看,实际就是体制从计划行政向市场机制改革,释放了被禁锢在一些闸口中的各种体制性剩余要素,提高了生产效率,以及打开了土地和城镇住宅禁止交易开关,并且使无价值土地和房屋一旦交易发生了资产化财富溢价。前述现代经济学几大由流动实体变量,按照有关经济关系组成的计算模型,没有体制安排及其变化变量,也不可能估算可以盘活和利用的体制性剩余规

模。所以,既无法解释 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也无法仿真出中国未来还能够中高速增长的前景。而对中国的未来来讲,体制剩余的规模多大,决定了其经济中高速增长还有没有潜能。

三、体制改革全要素生产率的数理分解

从 1957 年开始到 1977 年结束的计划经济,以及 1978 年以来体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新增长动能或者受到体制安排生产低效率和不动产无价值的影响而被抑制,或者因推动体制改革获得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和自然无价值不动产交易时零到市场价格水平的财富溢价。这是一种在假定体制不变投入产出经济自然增长之外,额外获得的产品和财富。因此,这一部分研究要做的工作,实际是对渐进转轨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构成中,因改革而获得的 TFP 部分进行数理计算和解释。

1. 计划和二元体制经济的自然增长率

由于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计划经济和渐进转轨国家的体制不同,其各自自然经济增长率的含义也不相同。

市场经济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率,可以看成是潜在最大可能的经济增长速度。其自然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一般不受体制安排的影响,但很可能由于市场出现失效,受流动性不足的影响,结果是实际的经济增长水平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水平。因此,市场经济国家也需要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刺激,使实际经济增长达到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

然而,计划经济体制和二元体制的自然经济增长,是体制假定不变的经济增长速度。计划和二元体制经济中,生产低效率和不动产无价值是常态,存在着大量的体制性剩余,增长潜能在于改革对体制剩余的释放。在体制闸口和开关不向扩大流量和将其打开方向改革的状态下,如果其体制不变,与市场经济国家相反,其自然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水平。

前面我们在第一部分中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快慢不一。1957—1977 年计划经济体制固定不变,因此,虽然这一阶段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幅度相对较高,但其经济趋势

典型地表现为自然低速增长特征。而1978年以来,体制不断地进行改革,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土地和房屋不断价值财富化,生产力得到不断的释放,虽然劳动和资本投入增长水平相对降低,经济趋势却呈现出高速增长的特征。因此,计划和二元体制国家潜在经济增长的水平,由禁锢在闸口和开关中的体制性剩余能否释放所决定。

2. 广义技术进步 TFP 增长率的讨论

二元体制国家 TFP 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家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 TFP 有所区别。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其 TFP 绝大多数来自于教育、知识进展、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新技术产业化,是这种广义技术进步在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了要素的生产率。

然而,二元体制经济 TFP 的来源,除了广义技术进步之外,还来自于:改革释放了被闸口和开关禁锢在计划行政体制内的剩余要素和资产,在其数量未变的情况下,通过市场化配置提高了投入要素的生产率,土地房屋通过资产化改革使其在市场交易时获得的零到市场价溢值。按照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上 TFP 来自于广义技术进步的假设,其严格的假设场景是:体制是完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如果不观察体制的特殊性,认为中国1978年以来的 TFP,仅仅来自于广义技术进步,与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实际的新动能构成差之千里,也忽视了46年以来,体制改革解放生产力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巨大贡献。

对于中国1978年以来的 TFP 增长率是多少,国外许多研究机构和国内众多学者们的分析,各自研究结果的数值高低不同。亚洲生产率组织和格罗宁根大学两大机构对1978—2019年中国 TFP 增长和贡献的分析为:TFP 增长率分别为3.43%和0.70%,对GDP增长率9.34%的贡献率分别为36.72%和7.49%。^{①②}从国内学者的研究看,中国 TFP 增长速度较高和贡献较大的有何平,他基于亚洲生产率组织数据基础上测算,结论是1978—2014年 TFP 增长为3.92%,对同期GDP平均增长9.44%的贡献率为

40.61%(何平,2022);TFP 增长速度和贡献较低和较小的有郭庆旺等,结论是1979—2004年 TFP 增长0.89%,对同期GDP增长9.46%的贡献率为9.41%(郭庆旺等,2005)。

按照中国科技部研究的有关数据,2003—2020年间,科技进步的 TFP 平均增长率为4.66%,对当期经济增长8.67%的贡献率为53.8%。一是同期 TFP 增长和贡献数据,远高于格罗宁根大学计算的0.93%和10.07%,也高于亚洲生产率组织计算的3.14%和36.21%。二是同期英美德法日韩等创新强国年平均 TFP 增长分别为0.09%、0.57%、0.42%、0.09%、0.41%和1.14%,对其经济增长贡献率在25%到52%之间。笔者认为,如果中国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起了如此大的推动作用,一是数据可能有水分,不符合实际情况;二是将改革获得的全要素生产率,混淆在了科技进步之中。使人们在经济增长贡献的分解中,看不到体制改革对生产力的解放。

已有学者文献对技术创新 TFP 会大力度促进经济上行增长提出了质疑。对于科技人力投入增加就会带来 TFP 加速增长的推断,美国经济学家琼斯分析1980到2000年欧美市场经济体研发人员投入和结果的相关变动关系,发现科学技术人员数量为向上向右的投入增长曲线,并没有形成 TFP 相应向上向右的产出增长曲线(Jones,2005)。学界将其称之为 TFP“琼斯批评”。另一经济学家菲斯佩奇对此评论:教育、知识和技术等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推动,结果一般不可能大幅度上升,而呈现为平缓的状态(菲斯佩奇,2009)。

那么,渐进转轨经济的 TFP 怎么分解呢?就是国民经济产出中获得的全部 TFP 中,既包含广义技术进步 TFP,也包含市场配置资源得到的生产率提高,还有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获得的货币深化和财富溢值。即:

$$T_{to} = T_{te} + T_{re1} + T_{re2} \quad (7)$$

其中, T_{to} 为全部全要素生产率, T_{te} 为广义技术进

① 亚洲生产率组织(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http://www.apo-tokyo-aepm.org>。因网站随着中国国家统计局调整历年GDP数据,亚洲生产率组织也进行调整。笔者这里用的是2021年从该网站下载的数据。

②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www.ggdc.net/pwt。

步,即知识进展、教育普及深化、人力资本积累、工作技能提高、新技术产业化等等获得的全要素生产率, T_{re1} 为体制改革改善要素配置提高的生产率, T_{re2} 为无价值的土地房屋改革后发生交易获得的市场价格的溢值。

四、体制改革获得 TFP 计算的数理逻辑

我们来看市场化改革生产率提高和资产化溢值获得的 TFP_{re1} 和 TFP_{re2} 。对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体制改革 TFP 来源解释,与对中国未来通过进一步的体制改革再获得新的 TFP,其计算在模型上不同。

1. 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数理模型

历史数据由 TFP_{re1} 和 TFP_{re2} 推动的 GDP 增长,其核算方面的算式为:

$$dG_{it}/G_{t-1} = d\{CH \times p_{ch} \times r_{ch} \times (\omega)\}_{cht}/A_t + a \times W_t \times (x_{t-1} - x_t)_w/W_t + b \times K_t \times (x_{t-1} - x_t)_k/K_t \quad (8)$$

其中, dG_{it}/G_{t-1} 为资产溢值和要素生产率提高获得的 GDP 增长率, CH 为城镇原有无价值住宅存量面积, p_{ch} 为城镇住宅交易价格, r_{ch} 为城镇住宅交易率,开关变量 (ω) 为1, A_t 为全要素生产率, W 为就业劳动力, K 为非金融企业总资本^①, $(x_{t-1} - x_t)_w$ 为农业就业比率和资本配置比率边际偏差值, $a+b=1$ 。

式(8)的作用,就是分解1978年以来,中国高速增长的改革 TFP 来源。式子的第一部分是城镇住宅资产化溢值 TFP_{re1} ,第二和三部分为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化改革配置改善获得的生产率提高 TFP_{re2} 。需要说明的:一是 TFP_{re1} 来源机理。式中偏差值 z 下年比上年缩小 $(x_{t-1} - x_t)$,表达偏差 x 值向标准值 y 的接近,意味着闸门 z 抑制得到放松和改善,体制性剩余要素每年转移一部分,并得以正常利用,要素的生产率得到提高。二是 TFP_{re2} 形成机理。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使其从无价值的生活资料成为了有价值的资产。当其资产化后,由于禁止交易的开关0得以打开成为1,在市场上一旦交易,则发生了零到市场价的溢值流量,于是买卖双方的帐

户都有了相等的一笔收入和支出。从宏观国民经济核算讲,在城镇原无价值住宅一定的交易率及数量情况下,其分配法和支出法计算的国民收入,在生产法增加值以外形成了余值,实际上也发生了土地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

计划经济时期,包括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土地视为无价值资源和生产资料。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港澳台投资和外商投资进入中国,建设工厂、住宅以及办公、商业和其他服务业楼宇需要土地。地方政府从农村城郊集体无价值和低补偿征用为国有土地后协议出让,²¹世纪初改变为地方政府在行政垄断土地市场上竞价出让。土地出让金是否应当进入GDP核算,在学术界发生了争论,有学者认为不应当计入(许宪春,2009),也有学者认为应当计入(李静萍,2008)。但是,名义土地出让金额一些年份中太大,统计操作中若直接以溢值的方式计入,残差实在太多。对此,实际的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中,因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形成行业增加值,还有金融行业房地产开发贷款和居民住宅按揭贷款利息增加值,以及后来居民自己产权的住宅要给自己交纳房租等方式,^②还是以生产法计入了GDP的核算。

然而,出让金收入和支出,在渐进转轨经济中,本质上是土地无价值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应当是收入法和支出法计算的GDP余值。笔者考虑已有生产法统计的实践,将边际出让土地作为当年新增的流量资本,除以总资本并乘以资本产出系数的方式,计算了土地资产化改革给经济带来的新增动力。

2. 改革使经济还会中高速增长的数理模型

转轨经济增长机理的研究,不仅是为了解释过去,更重要的是面对未来自然经济增长低速度压力,寻找通过体制改革能够释放的潜能,将经济增长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把体制性剩余要素通过市场化改革盘活摊入,使其发挥生产作用,推演改革提高效率获得新经济增长速度的算式为:

$$dG_t/G_{t-1} = d\{(AL \times R \times P) \times I_t(\omega)\}_{ALt}/A_t + a_t \times$$

① 运算中的资本量根据张军和施少华文有关数据和方法计算,见《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1952—1998》,《世界经济文汇》2023年第2期,第17—24页。

② 国民经济核算名词,国民账户体系(NAS93, National Account System 93)。

$$(W_{t-1} \times z_{wt-1} \times m_{t-1})/W_t + b_t \times (K_{t-1} \times z_{kt-1} \times m_{t-1})/K_t + c_t \times (dL_t + L_{t-1} \times z_{lt-1} \times m_{t-1})/L_t \quad (9)$$

其中, dG_t/G_{t-1} 为未来体制改革获得的 GDP 增长, AL 为未来资产化的土地总面积, R 为资产化建设用地交易率, P 为城乡建设用地影子价格, W 为总就业劳动力, K 为非金融企业总资产, L 为总建设用地面积, dL 为调水新增建设用地; m_i 为对应项的体制剩余生产要素分摊系数, $i=1, 2, 3, \dots, a+b+c=1$ 。

式(9)的作用,是为了仿真预测未来长期除了二元体制自然经济增长率以外,由体制改革可以释放的 TFP_{re1} 和 TFP_{re2} 推动的经济增长部分。与式(8)不同的是,一是这部分 TFP 来源,主要是对禁止市场化交易的土地,打开资产化开关变量为 1,从而其改革后一旦发生交易,获得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农村农民宅基地与住房相连,交易时宅地价格中包含了对地面建筑的补偿,因此未再单列。(9)式回归三要素投入增长斯密古典模型的原因是:中国目前有扭曲形成数量巨额的体制性剩余土地,需要盘活摊入模型中加以表达;还有国土开发利用率低于许多国家,可通过工程调水增加可利用土地,将土地供给从垂直曲线改变为向上向右倾斜的曲线;并且笔者因农业用地的增加值比例过低,投入增长的土地要素为建设用地。

五、体制性剩余:历史释放核算和未来可利用数量

笔者利用本文式(5)和式(6),对 1978 年以来,通过要素市场化和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所释放的体制性剩余要素和生活资料性资产进行了估算,对未来通过体制改革还可以释放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数量,以及未来改革可资产化的城乡土地规模也进行了估算。

1. 改革释放的体制剩余性要素和城镇住宅资产

从对 1978 年以来的历史数据分析来看,推进市场化改革较快时,体制性剩余要素和资产向提高生产率和财富溢值的释放加大。而当改革难度加大、改革动能边际递减和部分体制向计划行政回归时,体制性剩余要素和资产向提高生产率和财富溢价的释放就弱化。而未来若想实现中高速增长的目标,在于对目前仍然禁锢在计划行政体制中巨额的各类体制性剩

余要素和资产,通过大力度的市场化改革进行释放。

从生产要素数据方面观察,首先,是劳动力要素体制性剩余和释放。1977 年时,国际样板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标准值、中国农业就业比率偏差值和与样板国家相比差值,分别为 37.1%、74.51% 和 40.41%,当年中国就业总劳动力 40152 万人,其中体制性剩余农业劳动力规模为 15912 万人;2023 年时,标准值、偏差值和差值变化为 9.80%、23.5% 和 13.70%,总就业劳动力规模为 74041 万人,其中体制性剩余农业劳动力数量为 10143 万人。并且,1978 年时城镇职工 7196 万人,冗员率高达 35%,体制性剩余员工数量 2519 万人。

46 年时间里,从禁止到允许再到鼓励农业劳动力外出务工,颁发身份证、实行城镇暂住和农村人口到城镇上学就业等制度,累计转移了体制性剩余农业劳动力 33418 万人。1978 到 2009 年间,国有企业冗员进行下岗分流、减人增效和非国有经济中再就业改革,城镇各单位用人双向选择、劳动合同用工、工资绩效分配、人员能进能出和岗位能上能下等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也累计转移了体制性剩余员工 2019 万人。

其次,是国有企业资产的体制性剩余和释放。1978 年时,国有资产占全社会总资产比例、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偏差值、非国有经济资产利润率标准值、利润率差值、体制性剩余国有资产分别为 91.46%、3.37%、14.43%、11.06% 和 15630 亿元;2009 年时变化到 20%、3.22%、9.25%、6.03% 和 285753 亿元;到了 2023 年时又变化为 40.33%、1.36%、5.00%、3.64% 和 2487147 亿元。

1978—2009 年,国有经济资产进行债务重组、破产重整、抓大放小、中小企业转制,国有经济总资产占全社会资产比例降低到了 20% 左右,向效率较高的非国有经济释放和转移配置了 252929 亿元资产。

再次,从城乡土地和房屋的资产化观察,一是在 1998—2000 年三年间对城镇住宅存量进行了从无偿分配到资产持有的改革,而对居民新需要住宅进行由房地产公司开发、建设和市场化销售的改革。当时被改革的城镇住宅存量面积有 105 亿平方米,按照 2000 年价格,当时被释放的资产总量为 157290 亿元。二是土地推进了地方行政垄断市场交易的资产化进程。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023 年,地方政府从农村和城郊以无价值低补偿的方式征用了 21500 万亩集体土地,其中有偿出让 9638 万亩,累计释放土地流量资产 788615 亿元。

2. 未来中高速增长还可以释放的体制性剩余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使用其经济数据运算系统,模拟估算了未来供给侧新增长潜能的来源,即体制性剩余要素和资产的规模。

首先,在生产要素方面,一是 2023 年体制性剩余劳动力 12727 万人。大部分是以差值计算的农村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为 10143 万人。如果根据农业劳动生产率 and 耕地面积进行计算:每一农业劳动力在耕地上净产出 400 元/亩左右,即使不计耕地的地租成本,则需要 140 亩土地,才能与外出务工农民工的年收入相近。全国 19 亿亩耕地,只需要 1357 万农业劳动力耕作即可。另一小部分是行政事业和国有企业中的冗员,比率在全部国有单位就业的 25% 左右,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为 2583 万人。2009 年后城镇就业中向行政事业单位配置的劳动力越来越多。比如,2006 年党政等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有单位就业人员 1258 万人,2022 年数量增加到 1975 万人。从国有单位就业冗员比率变化看,从 2009 年的 20% 变化到 2023 年的 25%,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累计增加 1099 万人。

二是 2023 年国有企业体制性剩余资产规模为 282 万亿元。当年国有资产总额为 340 万亿元,总资产利润率为 1.36%,市场竞争性企业资产利润率为 5.00%,低效率造成的利润损失规模为 12.38 万亿元。前面也已述,利润损失数量除以非国有企业资产标准利润率,表达的就是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的资产数量,如果对国有经济和企业进行大力度的改革,会成为经济增长加速的潜在资本要素。

三是体制性剩余土地。因为至今为止,土地要素完全由计划行政配置,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土地也向非国有经济配置了一些,但是绝大部分仍然配置在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事业行政领域。农村集体建设用

地,也因计划进行配置、建设规划管理、用途行政管制,农村劳动力要素与土地要素无法实现组合,没有顺畅地配置到农民创业经营的二三产业之中。农民对土地使用变通从事的二三产业建筑和其他设施,大多都在 2018 到 2020 年有关联合进行的土地用途整治中被地方层层加码、范围扩大和“一刀切”中被拆除。生产要素浪费、闲置和低利用最严重和体制性剩余,主要发生在土地利用领域。

无价值城乡建设用地可以资产化的规模。2022 年,体制性剩余建设用地 18831 万亩,占总建设用地 71627 万亩^①的 26.29%。用地结构为,城市和县城、其他建制镇、农村居住、农村其他建设、产业园、矿业、交通和水工建筑等建设用地分别为 9807 万亩、3718 万亩、17262 万亩、13462 万亩、8000 万亩、3664 万亩、14330 万亩和 1203 万亩。其体制性剩余土地分别为 1080 万亩、744 万亩、8631 万亩、2729 万亩、2400 万亩、1099 万亩和 2149 万亩。^②

另外,在城乡土地和农村住宅资产化方面,到目前为止,城乡绝大多数存量各类土地以及农村农民房屋和宅院,仍然由于不能二级市场交易,并不是可定价意义上的资产,而是无价值的生产和生活资料。

从 2022 来看,据影子价格计算,还没有市场化交易放开的潜在资产有:农村宅基地、农村其他建设用地、城市与县城乡物流仓储用地、矿山用地、产业园区用地和农业用地,分别有 94.94 万亿元、109.14 万亿元、6.22 万亿元、5.50 万亿元、17.60 万亿元和 417.82 万亿元,建设用地潜在的总资产规模为 651.21 万亿元。而到 2035 年时,由于这部分土地的升值,资产规模分别可达到 131.42 万亿元、151.07 万亿元、8.61 万亿元、7.61 万亿元、24.36 万亿元和 578.36 万亿元,以 2024 年存量为基数的资产总规模将为 901.43 万亿元。

这些目前禁止交易而无价值的土地房屋生产和生活资料,如果进行可交易改革,可定价是资产,按照一定的市场价格和交易率,可形成资产溢值,成为未来经济增长动能的重要来源。

① 包括各地先租后征约 4000 万亩左右占用农业用地所建的镇、县和地级市产业园区用地。

② 水工建筑用地体制性剩余假定为零。

六、经济奇迹和下行解释及其未来增长的验算

前面已提到,笔者研究的另一工作是,将表达体制安排及变化的闸口和开关变量,嵌入生产、分配和需求函数之中,以此来计算通过较大力度的改革,释放被禁锢的体制性剩余,可以获得的新产出和经济增长潜能。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划分为三个阶段分析。

1. 1978—2010 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

前面已述,虽然就业劳动力投入和资本增长速度较高,但是在 1957—1977 年间,中国实际 GDP 平均增长 4.97%。其中 TFP 增长,格罗宁根大学平均增长的数据为-1.21%,亚洲生产率组织 1971—1977 年平均增长的数据为-2.04%。然而,我们将 1978—2023 年国民经济相关数据,输入(8)式计算,就二元体制经济运行的差值分析看,46 年 GDP 平均增长率为 9.02%,其中 TFP 增长 3.10%。从构成上分析,劳动力和资本配置市场化改革释放体制性剩余要素潜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 1.47 个百分点;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释放的溢值潜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 1.94 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后广义技术进步 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 0.6 个百分点。

1978 年前后对比,即使广义技术进步 TFP 增长,在计划行政经济时期为负,而在改革开放年代平均为正。因此,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中国 TFP 的正增长。

总计观察,在整个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人口劳动力大部分时期还上行增长的阶段,即使没有发生 1957—1977 年大的动荡情况下,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平均经济增长的最大速度也就是 6%。改革开放对经济增长贡献了 34.39%的动能,使 46 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了 9%的水平上。

从阶段划分看,1978—2010 年是中国改革从计划行政向市场机制体制发育和扩大的阶段,显著地释放了禁锢在体制安排各种闸口和开关中的体制性剩余,使经济高速增长获得了改革释放的巨大潜能。期间 GDP 实际增长率平均为 10.02%,其中 TFP 贡献获得的经济增长率为 3.7%,对其进行分解,劳动和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贡献获得的经济增长率为

1.45%,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贡献获得的经济增长率为 1.38%,广义技术进步贡献获得的经济增长率为 0.87%。改革开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 36.27%。

2. 2011—2023 年经济增长放缓的分析

2011—2023 年,渐进转轨进入了二元体制并存和胶着的时期,其经济运行和增长的特点是:一是体制改革增长的动能边际递减。经济体制较容易的改革都完成大半,剩下的体制改革需要攻坚克难;一些政府部门的经济管理和行政执法等,向计划配置和行政方式复归。二是国内人口变动进入收缩状态,国际经济循环遇到逆全球化的影响。人口增长和结构进入低增长、负增长、少子化和老龄化阶段,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形成压力;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中美经济关系趋冷等,从国际出口和国际直接投资占 GDP 比例下降方面,也形成了对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

从经济增长来源的分解看,这一时期 GDP 实际增长率为 6.48%,其中 TFP 实际增长率为 1.58%,TFP 增长水平比 1978—2010 年下降了一半。将 TFP 名义增长进行分解,广义技术进步 TFP 贡献的经济增长率降低为-0.09%;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转移贡献经济增长率下降为 0.30%;资本要素由于总资产中低效率国有经济资本占社会总资本比率从 20.55%上升到 40.33%,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为-0.70%;将流量土地出让金作为资本投入计算,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为 0.40%;城镇原有商品化改革房交易以及棚改和拆迁征地货币化安置住宅资产化等溢值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为 1.60%。城镇住宅资产溢值和土地流量资本投入产出二者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上升到了 2.00%。如果没有 20 世纪 90 年代和 1998 年开始的住宅商品化、土地有偿出让、棚改和征地拆迁货币化安置等改革,没有其交易资产化溢值和产出的支撑,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会落入 4%上下的中速增长区间。

3. 供给侧需要推进的改革

供给侧方面,需要将低效率地区、行业和企业中的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化的体制改革,配置到高效率的地区、行业和企业中;将无价值生活资料和生产资

料性质的土地房屋,通过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价值的资产和财富。并且,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原则,但需要改革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使其能够与市场经济运行相耦合(周天勇,2024)。

首先,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改革。一是在户籍管理改革等方面,其一,通过全面彻底放开户籍管制、子女随常住城镇务工家庭就地教育、住宅多元供给降低进城人口居住成本、完善进城人口社会保障等,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主迁移和城镇常住流动人口的真正市民化。其二,在用工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方面,通过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用工体制改革,并推进省直管县、乡财县管、合并减少治理层次和机构数量、精简非生产冗员,可提高国企劳动生产率和公共服务效率。

二是在国企改革方面,将国有资产比率在社会总资本中的比率从2023年的40%降低至20%以下,实行淡马锡模式,以资产利润率为国企领导主要考核目标,大部分竞争性国有企业实行以效率较高的民营资本为主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一些长期微利和亏损的国有企业进行破产、重整和拍卖等多种形式的改革。

三是在土地要素市场配置化改革方面,取消城乡建设用地和生产用地的计划管理体制,向城乡统一市场化配置的体制转型。非农业建设用地停止中央有关部门确定规模和分解到各中央重大项目和各省,再从省分解到重大项目和市及县的指标管理方式,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由市场供求和价格机制,盘活存量、开发增量,满足和高效地利用建设土地;废除城镇国有存量土地配置,先交由自然资源部门,再由其在行政垄断土地市场竞价出让分配的体制,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政事业单位、党政机关、其他法人团体和国防军事等闲置和愿意交易的土地,均在二级竞争性市场上挂牌,任何法人和自然人都可以竞买,收入归法人所有,政府以税收的方式进行分配,成为县市区可持续发展的税源;取消目前不同用途土地利用按照一定的规模需要由县、市、省、有关部和国务院审批的体制,因为全国各类存量土地闲置、浪费和低利用率很高,改由二级市场调节盘活为取得所需土地的主要方式。

其次,深化城乡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在坚持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不变的前提下,对城乡自然人和法人有使用权的土地房屋,全部登记注册、确权发证。延长各类土地使用年限,硬化城乡土地使用财产权,允许法人和自然人土地的使用权交易、定价、入股、出租、抵押和继承。改革城乡土地和农村住宅禁止市场交易的体制,建立竞争性的土地房屋市场,放开准入并撮合定价,使其成为可以交易和抵押的资产。

4. 供给侧体制改革对增长潜能的释放展望

渐进转轨国家经济与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的是,其生产体系并不是一个假定市场完全竞争而自然经济流动循环的体系。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不会在自然流动的生产系统上安装闸口和水泵等计划行政式的装置。但是,渐进转轨国家的生产体系,虽然自然流动运行的部分在发育和扩大,但是,体制安排的闸口和开关,仍然随处可见。

在本文前面部分中,我们估算了被体制安排阻碍和关闭在闸口和开关中的体制性剩余要素和资产的数量,并且在解释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部分中,阐述了体制性剩余淤积的加重。我们将有关数据代入算式(9)中,估算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启动大力度改革,2025—2035年释放潜能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可能。

首先,二元体制经济自然增长速度在2%左右。因为2014—2023年,广义技术进步TFP增长率为-0.11,并且全球各种类型国家的TFP都处于负和低速增长趋势。我们假定三中全会后启动改革,其翻转为0.5%;就业劳动力增长率为-1.19%基本是一个定数,劳动产出系数平均从2023年的45%向2035年的50%变动,其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为-0.57%;资本增长率平均增长3.98%,产出系数从55%向50%变动,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为2.08%。

其次,要素市场化改革提高生产率,加调水增地,获得1.91%的新经济增长率。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将三方面的体制性剩余加以释放,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如下。

一是将估算农业领域和城镇国有单位中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10144万人和2584万人,转移和盘活,输入(9)式,结果有效劳动投入增长1.11%,劳动产

出系数为 47.50%，如果改革 100% 能够完成，获得 0.53 个百分点的新增长潜能；如果改革完成 60%，获得 0.36 个百分点的新增长潜能。

二是将利润差值估算的国有企业体制性剩余资产，通过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使低效率国有经济中配置的动态平均 357 万亿元体制性剩余资本，向高效率的民营企业配置，同时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高这部分资本的生产效率，使得有效资本增长 3.05%，资本产出系数 26.06%，如果改革 100% 能够完成，获得新增长率为 0.80%；如果改革完成 72% 左右，获得 0.54 个百分点的新增长潜能。

三是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和调水增地方面，通过盘活体制性剩余 18830 万亩建设用地，使得有效利用土地增长 1.61%，产出系数为 26.06%，贡献 0.54 个百分点的新增长率；工程调水 2000 亿立方，开发和新增建设用地 15000 万亩，使建设用地数量增长 1.70%，乘以土地产出系数，也贡献 0.45 个百分点的新增长率。

再次，推进无价值城乡生活和生产性土地资产化改革，放开交易和市场定价，当发生真实交易时，其无价值到市场价格的溢值，会使未来经济增长获得 1.59% 的增长潜能。

从目前看，绝大部分土地仍然是无价值的生活和生产资料，并不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集体土地不得擅自在一级市场上出让，农民使用的宅基地和承包的耕地也不能擅自交易其使用财产权；城乡土地的一级市场，由地方政府行政垄断，二级市场交易没有放开。根据对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来源的分析，按照 46 年平均，土地有偿出让资本产出和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溢值，贡献的经济增长率 1.44 个百分点。未来，如果还是想获得这部分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潜能，需要继续全面深化对城乡土地的资产化改革，2025—2035 年间，将前述的各类潜在土地资产数量输入(9)式，溢值来源分布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我们推算上述总农村宅基地总面积中，每年空置、消失和转移的宅地到 2035 年累计在 7720 万亩，如果推进其资产化改革，推断每年形成的数量中有 26% 能够交易，其无价值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可贡献 0.57 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

二是推算农村其他建设用地、先租后征产业园的集体土地和农业用地，如果集体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和同价，直接进入一级和二级市场交易，每年交易率如果分别为 1.50%、2.50% 和 0.06%，其无价值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可分别贡献 0.43、0.11 和 0.16 个百分点，总计会获得 0.7 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

三是推算城市和县城工业物流仓储、矿业和国有产业园区三项建设用地，其不再由自然资源部门控制，放开由用地法人和自然人之间进行二级交易，分别按照每年 2.25%、3.00% 和 2.50% 的交易率，其无价值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可分别贡献 0.09、0.06 和 0.09 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总计会获得 0.24 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

可以看出，未来的 2025—2035 年，只要全面深化和推进大力度的体制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效率提高、资产化改革溢值和调水增地投入产出，分别可获得经济增长潜能 1.46、1.59 和 0.45 个百分点的新增长率，加上自然经济增长 2.00%，国民经济中位水平可保持 5.50% 的增长速度。

七、差值法及其对分配和需求侧的计算

需要指出的是，生产的增长，有需求的可能性边界。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仍然没有结束，还处在需求数量和质量水平需要提高的时代，而进一步大力度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需求侧的经济增长潜力仍然很大。

1. 需求侧增长潜能的差值仿真算式和运算系统

即使在假设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其“生产—分配—需求”一个自然的经济运行系统中，生产也并不自动创造需求，市场存在失效缺陷。凯恩斯的解释是，由于居民流动性偏好、收入的边际消费率下降和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三大原因，造成了总需求不足。因此，凯恩斯主张当国民经济发生萧条，需求不足，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时，利用扩张式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向经济运行系统注入流动性，扩大总需求，消除生产过剩，使过低的经济增长率恢复到潜在的经济增长水平上(凯恩斯，1936)。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基础体制的安排，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资源分配，而由市场进行配置；产权结构

的安排,使经济主体有适应市场需求组合要素进行生产,并获得利益最大化的竞争动机。

中国是一个特长周期转轨的国家,计划行政安排的分配和需求体制,也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增长的需求方面。与市场经济国家在分配和需求领域一系列的标准值比较,也在分配和需求领域,存在着偏差值和二者比较的差值。而且,市场经济国家消除需求不足的市场失效,是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扩大福利支出和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然而,二战后大多数计划经济国家,在其发展模式上,有着普遍注重积累、投资和生 产,轻视消费、民生和生活的传统。这种体制遗留,也惯性地延续到中国渐进转轨的特长周期过程之中。

如前所述,计划行政与市场经济并存的体制,使市场经济自然的收入分配和消费需求过程受到了干预。如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为国有土地出让的收入,几乎全部流入地方财政;居民收入房价比,远高于联合国人居组织专家建议 3 到 6 的水平;财政民生支出比例,也低于与中国发展水平相当国家的标准值;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比例占 GDP 比例低于一般国家水平等等。

笔者以萨伊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念,先是在供给端通过土地房屋资产化交易溢值、劳动力市场化配置改善两大类改革,调整初次居民收入分配,并进行了仿真运算,但结果还是不足以改变居民收入分配和消费分别占 GDP 的扭曲值,仍然扭转不了生产过剩。因此,依据二元体制国民经济运行特征和凯恩斯国民经济总需求约束理念,建立了包含体制安排和变化的,将闸口和开关变量内生于经济运行的,“分配—需求—供给”三环节流动循环的联立模型方程。需要说明的是,解释国民经济增长历史数据的体制内生因素,除了开关变量相同外,核算历史用闸口变量为 $(x_{t-1} - x)$,而预测未来则用 $(z_{t-1}xm)$ 。原因在于,对于过去的增长奇迹或者下行原因,主要是分析偏差值向标准值靠近的变化;而对于未来,从改革促进增长的角度看,则主要分析对体制性潜在收入及需求能力的挖掘和利用。

其系统联立方程为:

$$\frac{Q}{Q_{t-1}} = \frac{FI \times a_s \times (z_{fit-1} \times m_r)}{Q_{t-1}} +$$

$$\begin{aligned} & \frac{CI \times b_s \times (z_{cit-1} \times m_r)}{Q_{t-1}} + \frac{GI \times c_s \times (z_{git-1} \times m_r)}{Q_{t-1}} = \\ & \frac{CO_f \times a_{fd} \times (z_{fct-1} \times m_r)}{Q_{t-1}} + \frac{CO_g \times a_{gd} \times (z_{gct-1} \times m_r)}{Q_{t-1}} + \\ & \frac{IT_g \times b_{gd} \times (z_{git-1} \times m_r)}{Q_{t-1}} + \frac{IT_p \times b_{pd} \times (z_{pit-1} \times m_r)}{Q_{t-1}} + \frac{EX \times c_e \times (z_{ext-1} \times m_r)}{Q_{t-1}} - \\ & \frac{IM \times c_i \times (z_{imt-1} \times m_r)}{Q_{t-1}} = \frac{\sum_i^n A_i \times I_i(w)}{A} + a \times \\ & \frac{W \times (z_{wt-1} \times m_r)}{W} + b \times \frac{K \times (z_{kt-1} \times m_r)}{K} + c \times \\ & \frac{dL + L \times (z_{lt-1} \times m_r)}{L} \end{aligned} \quad (10)$$

其中, Q/Q_{t-1} 为国民总收入增长, FI 为家庭收入, CI 为企业收入, GI 为政府收入;分配式中的 a_s 、 b_s 和 c_s 分别为居民、企业和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相加为 100%; CO_f 为家庭消费, CO_g 为政府消费, IT_g 为国有投资, IT_p 为民间投资, EX 为出口, IM 为进口, a_{fd} 、 a_{gd} 、 b_{gd} 、 b_{pd} 、 c_e 和 c_i 分别为居民消费支出、政府消费支出、国有投资、民间投资和净出口占国民总收入比例; A 为 TFP, $\sum A$ 为资产化改革的项目; W 为劳动力, K 为资本, L 为土地, dL 为每年调水新增土地, a 、 b 和 c 是劳动、资本和土地的产出系数,相加为 100%; Z 为各项目差值, Z 乘以各对应项目为体制性剩余或者潜能, m 是体制改革对剩余和潜能的年度分摊率, $I_i(w)$ 为开关变量 1 或者 0。

(10)式的含义是,除了在供给侧改革时改善初次分配外,更重要的是在再分配和消费中,其一,居民工资收入方面,向国际主要经济体国家标准值靠近,提高中国工资占 GDP 的比例,缩小中国非正式和灵活就业人员在总就业中的比例;其二,改革和平衡垄断型国有公务、企业和事业单位,竞争性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股份有限单位,被歧视型私营企业,三者之间职工工资过高和过低的格局。其三,在需求体制中,向国际主要经济体国家标准值靠近,通过扩大政府民生支出比例和民营企业投资比例的改革,增强对居民消费品的购买需求和保持对民用消费生产的投入。因此,只有分配、需求和供给三环节协同的体制改革,才能彻底消除生产过剩,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

2. 需求侧现代化需求潜力与体制改革释放

中国未来需求方面的来源,主要在于中国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还没有结束,农业向工商业转移的工业化进程也没有完成。这既是一个增加居民收入的阶段,也是形成居民大规模物质财富需要的过程。期间,体制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和扩大居民消费,则会释放其巨大的需求潜力。

2022 年与中国发展水平相当的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水平标准值为 80.10%,中国城镇常住人口的数值为 65.22%,其中户籍城镇人口只有 48.00%。2035 年的目标是将人口城市化水平推进到 82%,并将在城镇中的部分常住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彻底市民化。市民化比例的提高,由于其收入水平的提高,实际就是需求扩大的源泉。

从劳动力就业结构工商业化看,2022 年前发展中国家非农业就业比率标准值为 90.28%,中国非农业就业比率 75.92%,劳动力就业工业化进程落后 14.36 个百分点。2035 年就业非农业比率的目标应当提高到 92%左右,除去自然到龄去世等退出的,城镇工商服务业需要吸纳 10757 万人转移就业。工业化过程的巨大需求,来源于居民进城和收入提高,对工业化的产品和住宅的支出增加。

耐用消费品居民拥有量方面的工业化,农村还在中期。城乡居民整体只进入到汽车社会发展阶段的前期。农村居民和城镇常住流动人口在拥有耐用消费品方面,2035 年结束其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时代,向富裕社会的水平迈进。城乡家庭汽车拥有水平,朝着成熟汽车社会国家每百户家庭拥有汽车的数量 160 辆的标准靠近。

建筑工业化水平方面,总体上看,村乡镇城郊居民仍然处在前中期,城镇流动人口分享城市和建筑工业化成果的水平也很低,而城镇住宅楼宇可能会提早进入需要更新的建筑工业阶段。需要居住从超高层向平面化调整,完善宅院和楼室内居住功能,装修、器具和铺饰等优美舒适化,提高建筑抗震、防火、保温隔热和电梯运行等方面的质量,并着手对老旧居住社区和楼宇进行大规模的更新改造(周天勇,2024)。

收入分配扭曲的最大问题是城乡差距,对此改革的任务是:将劳动力从就业机会少、劳动收入低的农

村农业,向就业机会多和收入水平高的城镇城市、工商服务业转移;给予农民自主土地的发展权,鼓励农村乡镇城郊居民以地为本,劳动要素与土地要素相组合,创业就业,增加收入;允许农民住房宅院、承包农地和农村其他建设用地交易和投资入股,获得财产性收入。

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消费体制方面,改革人口迁移体制,将低消费水平农村人口逐步向高消费水平的城市和省区转移;改革财政体制,增加民生支出数量,扩大民生支出范围;将城镇常住流动人口市民化,并提供廉租房和低价房,反哺增加其收入。投资方面,鼓励和扩大民营经济的投资规模。

前面已述,(10)式是一个从宏观经济需求管理意义上构建的一个变量交叉和模型联立的运算系统。2025 到 2035 年间,通过改革使偏差值向标准值靠近,笔者先是在分配环节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比例由 43%向 55%调整。

考虑出口比率提升的不确定性和自然经济增长率 1.5%、2%和 2.5%三种可能,全面深化体制改革,释放巨大需求潜力,最保守估算,未来可以实现经济 5.5%的中高速增长速度。体制改革的增长动能分布为:将居民消费支出占 GDP 比例从 29%向 40%调整,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为 0.75%;将政府民生支出占 GDP 比例从 7.7%向 20%调整,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为 1.08%;居民收入增长向投资的转化,民企投资占 GDP 比例从 20%向 30%调整,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为 1.10%;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将出口占 GDP 比例从 19%向 25%调整,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为 0.57%。国内工程调节水资源分配,开发未利用土地,其贡献的需求方面经济增长潜能,会在国外需求变动与国内需求变动之间形成弥补替代。

八、结 论

中国经济理论的学术任务是,需要总结 1978 年以来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经验及其内在的因果关系,找到符合中国体制国情的分析二元体制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的数理逻辑。依据其方法计算出中国在供给与需求侧还分别客观存在的体制性剩余要素及资产,居民收入提升空间,还有工业化和城市化

的巨大需求潜力。市场化改革,就是释放被体制禁锢和束缚的这些剩余、空间和潜力,解放巨大的生产力,以此加速国民经济的增长。这无论是在经济增长数理理论上,还是在未来改革实践有针对性的部署方面,论证了中国经济未来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可行性和可靠性。

未来 10 余年的时间,是中国经济能够中高速增长的战略机遇期。这一阶段,之所以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非常宝贵和不可错失,一是改革开放后,20 世纪 80 年代迎来了 1949 年后的第三次人口上行增长时期,在 20 年后的劳动力的积累量,将在 2035 年后开始衰减,这一时期可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为生产提供劳动力投入和市场需求,在严峻老龄化前完成富裕社会的转型。二是这一时期,劳动力成本还有一定的优势,规模化经济还能放慢资本收益率递减的压力,养老金成本在严峻老龄化之间还相对较低,经济在国际上竞争力还相对较强。三是一旦错过这一时期,释放生产力不够,居民收入水平没能理想提高,积累财富不够丰厚,待这两个阶段性比较优势趋弱和消失,可能再也没有从小康社会到富裕社会转型的机会。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发展是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动力,而改革是决定中国未来发展和命运的关键。通过要素市场化和土地资产化等大力度改革,并且对分配和需求方面的体制协同深化改革,使经济增长继续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保持 10 余年时间,顺利渡过老龄化严峻考验并跨越中高收入阶段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 2035 年时初步实现现代化,到 2049 年时成为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强国。

参考文献:

1. Jones, C. I. Time Series Tests of Endogenous Growth Model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5, 110(2): 495—525.
2. Jorgenson, D. W. The Development of Dual Economy. *Economic Journal*, 1967, 71: 309—334.
3. Dorn, E. D. Capital Expansion, Rate of Growth

and Employment. *Econometrica*, 1946, 14 (2): 137—147.

4. Solow, R.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 70: 65—94.

5. Harrod, R. F. *Towards a Dynamic Economics,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of Economic Theory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o Policy*. London: Macmillan, 1948.

6. Leontief, W. *Apostle of Planning in the Economists*, Basic Books, Inc., New York, 1976.

7. 郭庆旺、赵志耘、贾俊雪:《中国省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世界经济》2005 年第 5 期。

8. 国家统计局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科学技术部战略规划司:《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2021 历年版。

9. 何平著:《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手册》,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

10. 李静萍:《关于中国城市土地交易核算方法的探讨》,《统计研究》2008 年第 3 期。

11. 贾康等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企业管理出版社 2018 年版。

12. 伍晓鹰:《中国经济增长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最新实证结果及政策后发》, www.mbachina.com/html/mbachina/20240320/579934.html, 2023 年 12 月 9 日。

13. 许宪春:《关于与 GDP 核算有关的若干统计问题》,《财贸经济研究》2009 年第 4 期。

14. 周天勇:《体制剩余:转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体制性剩余要素市场化改革及经济增长的新潜能》,《学术月刊》2021 年第 4 期。

15. 巴特·菲斯佩奇著,柳玉林、郑刚等译:《创新与经济增长》,载于《牛津创新手册》,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 年版。

16. [波兰]奥斯卡·兰格著,王宏昌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17. [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 2005 年中译版。

作者简介:周天勇,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聘研究员,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国民经济运算与创新发展专委会主任,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大连 116025)。

[责任编辑:张震]